

引言 西化思潮研究与 20 世纪 中国哲学研究的拓展

20 世纪前 50 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在此一时期，古今中西思想相激相荡，各种理论思潮纷纷涌现。在众多的思想流派里，产生重要影响而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潮并不是很多，它们之间也有层次的差别，从哲学思潮的角度来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和三民主义；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文化思潮的角度来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民主义以及西化思潮。因此，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的对象也就有所不同，比如作为文化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作为哲学思潮的人文主义就有着非常不同的风貌。

从以上对 20 世纪前 50 年的思潮的分类来看，本书所研究的对象——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主要是一种文化思潮。“西化”亦称为“欧化”^①，欧化云者，谓文明创自欧洲，欲己国进于文明，必先去其国界，纯然以欧洲为师^②。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正是在古今中西的文化大交汇中，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针对中

佚名：《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译书汇编》第 5 期，1902 年 7 月 25 日。

国文化的建设所做出的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文化选择。

在不少人眼里,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相较于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三民主义等文化思潮,显得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依据和深刻的哲学意蕴,因此他们认为西化思潮与这些文化思潮难以等量齐观。的确,必须承认,西化论者对于其西化的主张,很少有人做出形上的思辨的论证,甚至在其言论中,严密的理论论述也很少见。但如能作深入的考察、同情的理解、实事求是的评价,又会发现西化思潮决非一种粗浅的文化思潮,其中也包含有以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为内核的精细内容。从政治思想言,西化思潮主要偏向于自由主义;从哲学思想言,西化思潮主要偏向于科学主义。当然,西化思潮并不等同于自由主义、科学主义,只能说它们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合。西化论者可以说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但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都是西化论者,如致力于民主宪政的张君勱,对科学主义思潮发展贡献巨大的金岳霖,都非西化论者。因此,在我们研究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的时候,必然会涉及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但对其间的关系要作严格的区分。

正是由于西化思潮在文化思潮中所处的地位,加之其内涵相当复杂,很难加以界定和把握,因此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对西化思潮的研究虽然有逐步深入之势,但主要是从与其相关的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角度入手。比较而言,对西化思潮的研究还处于一个边缘地位,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本书以“20世纪前50年西化思潮”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为了使西化思潮的研究走出这一困境,从而拓展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这种拓展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领域和内容上拓展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

必须承认，在西化思潮中，基本上没有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天道观、伦理学等哲学问题的内容。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此而把西化思潮排斥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这是因为第一 文化问题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作为 20 世纪一种主要的文化思潮之一，是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所不能回避的。^① 第二 正如我们已指出的，西化思潮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思潮，其中也蕴涵有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内容。这些内容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值得我们展开深入的挖掘；而且只有以西化思潮为研究对象，这些内容才能得到整体的研究。第三，哲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哲学从来就不能脱离我们的生活世界，西化思潮作为 20 世纪前 50 年颇有影响的一种思潮，实际上已经深深地关涉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不论是在历史上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是发展和建构 21 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在哲学史研究中忽视或轻视这一思潮，而是必须把这一思潮纳入到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视野中来。如果我们始终把哲学史研究局限于传统哲学的框架内，就不能使哲学史研究得到很好的发展，不利于新时期哲学的发展和建构。第四，从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上来说，哲学史研究不能仅仅走“纯化”一条路，哲学史研

参见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147—149 页。

究也可以而且应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①。西化思潮作为 20 世纪前 50 年的主要文化思潮之一，当然应在哲学文化史研究之列。

第二，从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上拓展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

近 20 年来，西方的一些现代哲学思想和观念纷纷东来，强烈地影响着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对于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我们必须加以辩证地对待：一方面，我们既不能不加思考地接受和照搬西方的哲学思想和观念而落入西方的话语体系，脱离中国实际的哲学思想是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也不能将西方的哲学观念与构架毫无选择地运用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上，而不考虑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因为这有着诠释错误或诠释过度的危险，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反而有害。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完全排斥这些哲学思想和观念，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这些新思想新观念不但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为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方法。因此，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基础上，也要大胆地引入和吸收对我们有用的西方哲学的思想和观念。在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的研究中，我们就将引入这样一些新的哲学观念 比如‘现代性’、‘全球化’等等。我们认为 引入这些现代西方的哲学理论与观念绝对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它们对西化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提供了可能。虽然这些哲学观念

^① 萧蓬父：《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吹沙集》巴蜀书社 1991 年版 第 410 页。

的涵义至今还是人言人殊，但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们将力图做出自己的厘定，而不把它们置于相对主义的境地。

总之对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的研究是研究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需要。“20 世纪中国哲学”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标志着不同于传统形态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过程”，“这里所说的‘现代形态’，不是指在以某一重大政治事件为起点和终点的政治—社会历史时期中的哲学发展，而是指哲学自身的形态所发生的质的飞跃及其新质的展开”^①。与此相适应，20 世纪前 50 年的西化思潮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与前此的西化思潮有了质的区别，呈现出一种“现代形态”。这就不仅从哲学形态上证明了将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纳入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理性，也表明了在进行 20 世纪中国哲学时对西化思潮进行深度研究的必要性。对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的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容。

本书将从七个方面展开对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的研究。第一章对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从总体上作一勾画；第二章考察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对中国现代化的设计；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探讨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运用现代性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来研究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第七章则分析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改造。这七个方面看似分散，但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李维武：《20 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1—32 页。

必须说明的是，对西化思潮进行专门和附带研究的论著已经大量涌现，其中也不乏精深之作，^①这表明人们对西化思潮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深入。这既为本书的写作带来了方便，也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本书只是希望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挖掘更为丰富的史料文献，尝试运用新的哲学理论与方法，力图将西化思潮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参见本书附录一：《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研究综述》。

第一章 20 世纪前 50 年 西化思潮概论

20 世纪前 50 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 50 年。政治上，中国在这 50 年中最为优先的追求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由此面临着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艰巨任务。在经济上，中国一方面要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发展脆弱的现代化经济，另一方面又要与西方列强的经济剥削作抗争；在此期间，虽然中国为现代化的建设倾注了心力，但几乎没有间断的战争使这一进程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在文化上，中国的思想界则在不断分化组合，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为探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提供着各自不同的答案，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西化思潮就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一时代问题提交的答案，是一种颇有影响的现代化理论。在本章我们将对 20 世纪前 50 年西化思潮的时代背景、反传统特征、与其他思潮的关系及自身谱系作一简要的论述，从总体上对这一思潮作一勾画。

第一节“过渡时代”之“过渡时代”

20 世纪前 50 年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过渡时代”。从鸦片战

争至今的大约 150 年的时间，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过渡时代”，即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 150 年的历史，又正好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均为 50 年。第一个 50 年为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开始感到中国文明的不足，并开始谋求中国文化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上的改变，这分别通过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体现出来。但这种改变是在中国文化的框架内进行的，也就是在所谓的“中体西用”的文化理论下进行的社会变革。第二个 50 年是我们所要着重研究的 20 世纪前 50 年。第三个 50 年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在此期间，中国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开展现代化建设，探索并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二个 50 年恰恰是这 150 年历史的“过渡时代”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过渡时代”中的“过渡时代”在这 150 年的历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个 50 年即从 1900 年到 1949 年。之所以选择 1900 年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是因为 1900 年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来说，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年，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把戊戌维新失败的 1898 年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因为在这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做出了重新的估价，开始对“中体西用”论做出批评和反省。但是，就思想史而不是就政治史来说，1898 年远远没有 1900 年重要。因为在进入 20 世纪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涌动着不同的思潮，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气象。而直接导致这一局面的就是 1900 年的庚子之变。关于庚子之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当时的人们已有许多议论。比如 1909 年 6 月 14 日《民呼日报》的“社说”就指出庚子之变决定了新思想取代旧传统的趋势：

吾国政治之窳惰，其积弊数百年于兹矣。其所以能上下相安于无事者，以旧习相沿，民无远志故耳。及欧力东渐，吾国首当其冲，相形见绌，昔日之隐恶，遂一发而不可复掩。于是奸人猾吏，及益冈法舞文，弥缝其弊，以图掩一时之耳目，保私人之禄位。而养痍成患，遗祸弥深。此三十年来政事之废弛，更有甚于昔者。职是故也。自甲午败后，吾国民大梦初觉。然一线光明，未尝普被。迨庚子更创，几于沦亡。触目惊心，始知旧法之非计，而官吏之贪利纵患，始昭昭在人耳目，莫不欲取而新之。此实民权发展之萌芽，民气扩张之基础也。^①

在 1914 年 12 月的《留美学生季报》中有一篇论中国与西洋文明的文章，其中也指出了 1900 年是中国思想发展的关节点，因为这一年开展了“吾国文明拒绝西洋文明之大激战”，而此次中西文明大激战的结果是西方文明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文章说：

吾国当拳匪乱劫以前，一般士大夫之视欧美列强也，罔不斥为蛮夷戎狄，而不屑与之等齿。其矜傲自恃之心，盖亦未始无故焉。……鸦片战败，五口开市，彼族恃其通商传教之术，汲汲伸势力于吾国，而吾所恃为数千年相传之文化，乃始受初度之压迫，一时上下，莫不思有以拥护之。自甲午丧师辱国以后，一般先觉之士，始恍然于西洋

^① 《社说——责难国民篇》马鸿谟编：《民呼 民吁 民立》报选辑》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02 页。此文作者不详，以下引文凡未注明作者的，均为同样原因。

文明之优胜 倡言改革 偏于激进 其反动力之影响 及乎庚子而大盛，卒有拳匪之祸。是为吾国文明拒绝西洋文明之大激战，亦即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之大激战也。激战之结果 如赔款谢罪等 举国皆知 而独为常人所罕言者 则为西洋文明之大侵入。盖是役以后 虽顽固守旧之士，亦知非改革不足以救亡。派遣留学之风，一时大盛。其用意在拾他人之长 补己之短。而一言以蔽之 则效法西洋文明而已。

文章对义和团运动的批评虽有不实之处，但从东西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却是正确的和极富启发意义的。正是在 1900 年之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进行激烈地反传统的工作。可能正是考虑到思想界的这种新的动向，加之在面临新世纪的时候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态和气象，梁启超于 1901 年在《清议报》上发表《过渡时代论》一文 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今日之中国 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他进而以其饱满的笔调发挥“过渡时代论”的意蕴：

故今日中国之现状 实如驾一扁舟 初离海岸线 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 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 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 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 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 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 是学问上之过渡时

代也 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缠节之俗 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语其小者，则：例案已烧矣 而无新法典 科举议变矣 而无新教育 元凶处刑矣 而无新人才 北京残破矣 而无新都城。数月以来 凡百举措 无论属于自动力者 属于他动力者 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故今日我全国人可分为两种：其一老朽者流 死守故垒 为过渡之大敌 然被有形无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过渡之途者也 其二青年者流 大张旗鼓 为过渡之先锋 然受外界内界之刺激 而未得实把握以开过渡之路者也。而要之中国自今以往，日益进入于过渡之界线 离故步日以远 冲盘涡日以急 望彼岸日以亲 是则事势所必至 而丝毫不容疑义者也。^①

自从梁启超提出“过渡时代”的概念以后，“过渡时代”一词就成了当时思想界常用的词汇。一些论述当时中国政情的文章均以“过渡时代”来立论。虽然梁启超并没有交代“过渡时代”的时间界限，但我们可以借用“过渡时代”来界定 20 世纪前 50 年中国的时代特征。

在 1900 年到 1949 年的短短 50 年时间里，古今中西各种哲学观念、思想主张在中国思想界相激相荡，各种思潮纷纷在中国思想界出现，致使中国思想界显得格外复杂、纷乱。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一时间纷纷成为人们探讨和信奉的对象，问题、主义、立宪、独裁，也不断成为人们日常辩论的话题。中国仿佛成了人类各种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第 29—30 页。

思想的大熔炉、竞技场。那么 在这一纷乱的‘过渡时代’里 中国思想的发展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总体特征呢？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 虽然在这 50 年里思潮纷扰，但产生重要影响和具有生命力的思潮并不是很多。从文化思潮的角度来说，20 世纪前 50 年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四个主要思潮的发展。这四大思潮是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以及西化思潮。当然，基于不同的内因和外缘，这四大思潮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又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命运也殊不相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在 1919 年崛起之后就一直在中国思想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后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进程的主导思想。三民主义在 20 世纪前 50 年与国民党的兴衰相伴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西化思潮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前 50 年 在思想界具有重要的地位 且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一直没有中断，且有日趋强烈之势。值得指出的是，除三民主义外，其他三种思潮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现在，仍然为今日中国思想界的三种有影响的文化思潮。

第二 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思潮 这四种文化思潮在观念上虽然有很大的不同，所思考的重点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都是在为谋求中国的现代化而提供方案。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先进的中国人在 20 世纪初已经认识到中国存亡的关键就在于中国能否现代化。这时中国人的现代化观念虽还很朦胧，但已有实质的现代化行动，包括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经济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但是 在 20 世纪前 50 年，由于人们具有不同的现代化观念，对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也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对于中国到底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也就有了不同的答案。西化论者认为中国

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制度乃至心理、思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宪政国家；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认为西方文化有它的致命伤，中国在学习时一定要小心鉴别，中国在进行现代化时一定要发挥中国文化的特长，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者则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认为中国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是要先走新民主主义道路，再继而走社会主义道路；三民主义，特别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有相当的一致性，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中国现代化方案。虽然随后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设计方案在中国成为了现实，但是，在哲学思想史上，我们不能以一种思想在现实上的实现程度来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中国近代各种社会思潮，不管其成败如何，不管其内蕴的正确程度大小，都从属于历史性的巨变 作为社会设计 都是这场社会选择的答卷。”^①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近代的各种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潮。我们认为，在 20 世纪前 50 年，上述四种文化思潮都与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主题相适应，都是这一时代的思想主潮。

第三 20 世纪前 50 年的各种思潮都是古今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的结果，任何思潮的发展都要受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国情所制约。而在这 50 年中，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以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维护国家主权。这样，政治运动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这 50 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就必然导致各种文化思潮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或者说各种文化思潮都对应着相应的政治运动。与政治运动联系紧密，是近代各种文化

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 页。

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一方面导致了有些思潮借助政治的力量得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使得有些思潮由于依附政治而失去了固有的独立性，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它使哲学家们所关注的，首先是哲学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和作用，而不是哲学自身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的转变”^①。以这 50 年中的四大主要文化思潮为例，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指导思想，它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而不断增加，但不能否认它有过教条化的事实；三民主义则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沉浮而沉浮，曾被多方面地歪曲与附会；以西化派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被称为“第三条道路”，虽然试图参与政治，但常常处在“左”与“右”的夹缝中，往往两边不讨好，自由主义因找不到支持自己的现实力量而在近代中国始终处于一种半边缘的状态；相对于其他三种思潮而言，文化保守主义中的现代新儒学算得上是一种书斋中的学问，它虽然在学理上回应着中国如何现代化这一问题，但由于与现实政治不直接相关，因而始终是曲高和寡，然而也正是如此，它才建立了体系完整的形而上学，开创了中国儒学发展的新局面。

第四，在 20 世纪前 50 年中，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至，令人眩目，但是对于有些思潮，国人基本上来不及消化吸收，更谈不上对它们作整体上的把握。这正如梁启超批评世纪初新思潮的引进时所说的：“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

李维武：《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转型》，《中华文史论丛》第 62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6—107 页。

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所谓的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并不仅仅是西化论者，但西化论者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则是事实。

入 无组织 无选择 本末不具 派别不明 惟以多为贵 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 草根木皮 冻雀腐鼠 罔不甘之 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①蒋梦麟也以同样的笔调来形容这 50 年西方文化输入的情况：“由华东沿海输入的西方文化，却是如潮涌至，奔腾澎湃 声势慑人 而且是在短短 50 年之内涌到的。西方文化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正是盛极一时，要想吸收这种文化，真象一顿饭要吃下好几天的食物。如果说中国还不至于胀得胃痛难熬，至少已有点感觉不舒服。”^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如上所说，这些思潮受到了现实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短短 50 年的时间里，由于历史进程的快速多变，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吸收、消化以及对自身文化的创造，均缺乏充分的内在的准备条件；加之中西文化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中国人很难对西方哲学与思想有准确的理解，导致了对这些思潮把握的难度。相对而言 这 50 年中的四大主要文化思潮的情况则要好得多：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的国情发展出以新民主主义为重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 新民主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作了很好的设计 其本身也可算做是中国自身文化的创造；三民主义也不失为一种博大的思想体系，其中有值得我们挖掘和利用的成分；西化思潮中的自由主义在 50 年的发展中，虽然受到现实政治的排挤，但从学理上言，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比较契合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新儒学则被称为中国儒家文化的“第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第 71—72 页。

蒋梦麟：《新潮·新潮》岳麓书社 2000 年版 第 241 页。

期发展’^①，现代新儒学在对西方哲学的回应中，无论是在心学还是在理学方面，都完成了庞大的形上学体系，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

总起来说这 50 年“过渡时代”的中国思想的发展看似纷乱，却是有迹可寻的，看似粗糙，却有十分精细的内容。在对 20 世纪前 50 年作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概述之后，我们将把论述的焦点集中到西化思潮本身。

第二节 西化思潮的反传统特征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诞生，预示着中国将被迫纳入到西方文化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因为向全球扩张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和需要所决定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种前近代的非西方文化能够拒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因此，中国想要参与到这一世界历史进程而不被这一进程所淘汰，就必须以西方为中心，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的观念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初，大多数中国人却很难接受这种观念，因为中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的文化要优于其他的文化，“夷夏之辨”的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一样，其中心主义特征也是相当突出的。这两种中心主义特征最为强烈而其特质又相异的文化相遇在一起，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文化冲突。

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408—435 页。

两种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能是一方立即战胜进而取代另一方。“凡一文明之深入异域，必经过几度障碍，迂回曲达，吸收旧有之良法美俗，而始为国人所信仰。初非能一往直前，以短时期战胜旧有之文明。而迳易其位置也。”^①特别是两种都具有强烈中心主义特征的文化间的冲突，只可能是逐步的“涵化”（acculturation）过程。文化涵化既是对外来文化、异质文化系统吸收、改造和重建的过程，又是对本土文化重新估价、反思和改铸的过程。在这一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两种文化系统相互对流，相互作用。西方文化的强势性及其现代性特征所具有的规定性，决定了中西文化在冲突过程中的地位变化，即中国文化必定要“西化”，但这种“西化”的过程必然具有分层次性的特征。这样的特征表现为中国在近代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时所持有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虽然承认中国文化在物质（进而制度）层面不如西方，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它是在明确中国文化的优势性和优先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中体西用”在特定的时期当然也是一种西化思潮，因为它表明中国文化向西方文化的初步退让，且这种退让在当时看来是相当激烈的。即便如此，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信心仍是相当强烈的。这种状况一直到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进而在随后的义和团运动中中国文化决定性的失败之后，才得到改变。虽然在中西文化的对决中，中国文化决定性的失败只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失败，但中国知识分子随即将这些失败归咎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最核心部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层面产生了怀疑。正是在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

孙恒：《中国与西洋文明》，《留美学生季报》1914 年冬季第 4 号 第 92 页。